



您为此书添加的 KINDLE 笔记：

## 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

作者：刘海影

免费 Kindle 极速预览：<http://z.cn/0P7nn7A>

### 106 条标注

标注（黄） | 位置 452

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标注（黄） | 位置 457

埃里克·贡（Erick Gong）2010年在《国家的财富是不是在公元前1000年就被决定了？》（W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Determined in 1000 BC?）一文中的

标注（黄） | 位置 473

尼尔·弗格森在《文明》（2007）中以西欧的国家间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与工作伦理来解释西方的崛起。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2006）、曼瑟·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2007）、达伦·阿西莫格鲁的《国家因何失败》（2012）、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等著作也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

标注（黄） | 位置 538

中国实施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土地有趋于分散的趋势。青木昌彦（2013）指出，多子继承制使土地所有权极易变更，同时促成了在不同村落和不同阶层之间形成复杂的多层次租佃合同网络。在产权所有人与租佃农户之间存在居间组织（租栈）同时充当多个地主的代理人，这些地主拥有分布在各个村庄的大量小块耕地，而租栈从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农民租户那里收取租金，并给官府交税。这种制度安排强化了农地耕地规模的限制。这种碎片化的农地制度安排与中国湿地种植技术是相吻合的。这种种植技术从播种到收割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很难用机械或者劳动力（或者奴隶）替代。这种情况下，没有等级监管的农民家庭具有最好的激励兼容性，只需要在开发和维护灌溉系统方面由种族或者社区提供起码的组织服务即可。政治方面，这种制度安排也有利于人数有限的地方政府对汪洋般的农户实施征税与统治。为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农地安排，中国发展出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依靠单位面积上密集的劳动力投入保持了单位面积的高产量。青木昌彦也指出，由于存在着大量闲置劳动力，对农户而言，合理利用劳动力供给比长期投资于机械更廉价。中国的气候特点（充沛的日照与雨水）以及主要品种（水稻）也有助于亩产的提高，但这以精耕细作为前提，并且土地得不到轮作休耕。农田要求连作、轮作、间作、套作，不仅要一年一熟，还要求最好一年能有多次收成，这使得土地必须依靠肥料来保持地力，而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要施的肥越来越多。同时，连作的土地必然无法供养牲畜，极大比例

的农户不得不依赖人力完成耕种的繁重工作；畜力应用得少也造成农户不得不依赖简陋的农具，技术进步几乎没有出现。以明清为例，有利于深耕或者开垦厚重黏土的特用深犁是农业生产急需的，却没有得到推广，得到推广的反而是人力犁。明末徐光启等人曾经试图从西方引进先进农具，如龙尾车、玉衡、恒升、塔式风车等，但都因中国工艺达不到要求等原因而没能成功。畜力应用的减少是普遍的，以至于有牛者即被视为富人，大多数传统农户都没有，这与欧洲农业对牛、马等畜力的高强度利用形成了强烈对比。巨大的人力投入、较少依赖畜力、简陋的工具、以粮食作物为主等特点的有利一面是，中国农业的平均亩产较高，不仅高于欧洲，也基本上达到了古代世界单位面积能够提供的最高产量；但不利的一面是，由于人均耕地数极低，较高的亩产却只能换来相当低的人均产出。同时，产出对高投入的严重依赖导致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一旦由于自然或者人为原因减少投入，产出即会大受影响。由于人均产出距离最低生存要求的差距很窄，这种脆弱性很容易就转换为社会稳定性隐忧。从历史上看，这一特征正是中国灾难性的王朝兴衰的最重要根源。而这种灾难性的王朝兴替，除了造成人口大灭杀之外，也反过来造成资本积累的中断与倒退，周期性地压低了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本化

---

标注（黄） | 位置 563

重犁是一种拖带工具，俗称“萨克森轮犁”，装有车轮用以控制犁地的深度，犁头是垂直的，犁铧将地块翻过来。这种犁不仅可以盖严种子，还可以疏松土壤使渗进的水集中在作物根部，便于吸收。重犁是翻耕黏土和森林地的好工具，但购置重犁需要较多资金，使用重犁需要较多耕畜，一般是几头牛拉一架重犁。

---

标注（黄） | 位置 567

6]。按照《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卡梅伦，2009）的说明，重犁在罗马时期即已经在北欧被发明，到10世纪或者更早，这种犁已经传遍欧洲各地；12世纪，马轭被发明，随后400年马替代牛成为主要耕地工具。

---

标注（黄） | 位置 573

庄园将经济与政治控制融为一体，在欧洲大陆构造出众多大型经济组织。庄园内，劳动者以劳动和众多其他义务来交换使用土地、接受保护、司法审判、各类设施的权利，每个自给自足的庄园实际上都具有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设施，并且，这种资本化设施设备不断积累，

---

标注（黄） | 位置 581

庄园是远比中国原子般的农户家庭更大的经济组织，也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同时，欧洲虽然战乱不断，但战争大多数时候限于职业军队之间，不论王室统治疆域如何变化，作为基础单位的庄园与各地的行政宗教单位很少受到影响，往往不过是昨天向甲纳税，今天向乙效忠而已，经济的资本积累很少被打断或者摧毁。这是庄园制相对于中国小农家庭制度的另一重要

---

标注（黄） | 位置 618

欧洲是分裂的、多样化与多元中心的。欧洲分裂的政治结构与多样化的经济自然环境，奠定了西欧产品多样化与生产专业化的基础，导致了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

标注（黄） | 位置 628

周掌握的一整套文化传承（三皇五帝）具备强大的向心力；周掌握的兵车技术似也不错。在

标注（黄） | 位置 630

宗教方面，商民族的宗教具有更多的自然神灵崇拜特点，周朝则建立起以祖先崇拜为重要特点的新宗教。殷人祭祀是为了报答鬼神，让鬼神能够生活，故用祭器，大多形质丰伟，耗用极大，祭品除了鸡鱼之外，也包含人性，所以被称为“殷人敬，率民以事鬼”。周人祭祀的对象变成了被神化的祖先，由于是祖先而不是自然神灵，与人的关系亲近了许多，不再需要那么丰厚的祭品，但对礼仪的强调程度却上升了，所谓“周人文”，“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周人将自己的族谱编入从三皇五帝以来的传承，不仅用以论证自己政权的神圣性，更将祭祀宗教仪式的严密性与神圣性推到一个新高峰（黄奇逸，

标注（黄） | 位置 655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一书中指出，文明初始状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暴力潜力以及使用暴力获利的诱惑，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社会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建立集体暴力能力对社会个体成员暴力能力的相对优势。

标注（黄） | 位置 658

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社会，暴力必须被控制，途径是由政府机构建设出在暴力机器上的压倒性优势，从而建立政府治理结构。国家或基于民众契约，或基于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阶层的暴力剥夺，或者兼而有之。按照诺思的意见，这取决于暴力潜力的分布。若暴力潜力平均分配，则更可能是契约型国家；若暴力潜力被统治集团垄断，则更易于建立剥削型国家。

标注（黄） | 位置 672

文明诞生之初的一个特点是，往往需要借助血缘或者宗教的力量，才能将较大规模的人群组织起来。在农业文明诞生之处的各社会，各个家庭、家族与氏族掌握的武力是分散且大体均衡的，天然地有利于原始民主制度而不是原始专制制度。这

标注（黄） | 位置 677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2012）中指出：“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一经发明，它就会刺激他人的模仿。因此，战争不仅造就了国家，也造就了部落。”

标注（黄） | 位置 681

需要从部落松散组织的形态向严密组织的国家形态转换。一个内在矛盾是，当一个组织（一般而言是政府）垄断了暴力优势之后，如何对该组织成员滥用暴力以谋求自己的利益进行约束？将这一行为定义为专制，则问题转化为，如何防止专制对社会的控制？

标注（黄） | 位置 684

从历史上看，存在着两种制度可以兼顾社会对暴力与专制的双重防护。一种是古代希腊城邦制，一种是条顿部落王国制。在希腊城邦制中（例如雅典），凡属于希腊部落成员，都享有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权，虽然这种参与权是分等级的，但却不是人格化的。内部暴力的控制依赖法治，而对外武力由军事专才轮流指挥，避免产生僭主。公民大会是最高决策单位，公职则经过选举担任。虽然奴隶的确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上述政治安排的确起到了防范内部暴力，也防范专制产生的机制。与之相反，条顿部落王国中存在着依照血缘特征而享有王权的国王。但条顿部落王国的国王并不享有专制权力，而是受到自古传递的法律与贵族阶层的制约。如格奥尔格·耶里内克在《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2012）里所言：“君主制的条顿国家则从一开始在形式上就是封建制的，即君主与人民不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作为独立的因素相互对立。因此，在那段时间里，国家实质上就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对于君主而言，法律建立了使得他可以要求人民服从法律的权利；而人民则有权利要求君主遵从法律施加的限制。”不仅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受到法律与习俗的制约，在每一级封建关系层面，例如庄园主与庄园农夫之间，都接受这种法律与习俗的制约。换言之，君主（或者庄园主）的权力是在契约关系制约下的、以附带义务作为前提的权力，而非绝对权力。这似乎构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在古代社会，假如没有对外族的大规模征服与常备军，出现的政治结构往往并非专制类型。

标注（黄） | 位置 697

一旦掌握较高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开始实施大规模征服，并统治人数众多的异族，专制权力将难以避免地逐渐强大起来。中国的周代提供了这方面经典的案例。

标注（黄） | 位置 706

周王朝治下民众被分为两类，国人与野人。国人指周联盟部落成员及其后裔，野人则是在周朝统治者来到本地之前的当地原住民及其后裔。国人接受“六艺”训练（礼、乐、射、御、书、数），有权参与一系列的宗教、政治过程，但承担服兵役与作战义务；野人不参与服兵役与作战，在井田制制度中承担劳役与缴税的义务。

标注（黄） | 位置 709

阿西莫格鲁的理论，这种状态下建立的政治机制有很大的概率以确保统治者垄断权力、攫取经济利益为目标，并以占据优势的武力为后盾，被征服者只是作为被统治阶层来为统治者提供所需要的劳役与赋税。在各受封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而是统治关系。

标注（黄） | 位置 713

各诸侯按照规定保持大小不一的军事力量，而周王自己则保持着最大的常备军。这种结构建立了一种形势，让周王（及其诸侯）的权力逐渐成为世袭而不受传统氏族议事制度（例如传统的酋长会议或者巫覡民主制）约束的权力。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令周王朝成功地建立起可以复制并推广到全部被征服地方的政治治理机制，与此同时强化了自己不受习俗、契约与传统议事制度约束的权力。

标注（黄） | 位置 718

文字能力的改进，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的政治伦理水平与治理能力，一种统一的政治体系随着诸侯国在各地建立、繁衍与繁荣而逐步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建立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政治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如何更好地统治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以提供统治者所需要的足够剩余物资以及军事力量。既不同于古希腊公民共同体类型的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政治决策，也不同于条顿王国接受法律的约束，周王朝所建立的政治结构贯穿的逻辑越来越强调朝廷对百姓的无所不至的权力，而不接受任何现实力量的约束。

标注（黄） | 位置 723

周王室对各封地诸侯的统治是基于宗教与文化，而不是基于科层制体系，封建制度必然具有的离心力逐渐令王室统治能力下滑。对于不服号令的诸侯，周王室往往并不占据绝对的武力优势，渐渐地，周王室丧失了对诸侯国的直接控制力，

标注（黄） | 位置 751

庄园制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本质上，每一个庄园都将军事力量及经济基础结合起来，对于农户而言，庄园主既是雇主，也是政治首领，从而执行着政府的角色；庄园主既执行权力，也受制于世俗法则规定的义务，必须提供庄园经营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包括防御作战、修筑公路桥梁、开设法庭等）。这种权力与义务相互支撑的制度安排，有效地降低了庄园制对人身自由限制可能导致的激励失效，令庄园制具有相当水平的效率与经济合理性。

标注（黄） | 位置 765

多元化强化了欧洲经济的多元性，庄园内手工业的继承制度也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如此，多样化产品与广泛的贸易意味着地区专业化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而专业化鼓励了西欧取得比中国更快的技术进步。产品多样化、贸易的广泛存在提供了技术进步的环境，而技术进步的最终源泉来自于生产者有充分的动力去探索更好的生产技术。这方面，小规模治理结构要优于大规模的治理结构。多元权力中心的一个重大优势是，竞争贯穿着欧洲的历史。

标注（黄） | 位置 799

第一，宋朝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坚实的技术进步基础上。

标注（黄） | 位置 811

第二，军事方面，面对北方强敌，宋军战斗力一直居于下风，不得不在人数与装备方面努力弥补，相应地对财政收入以及军事技术提出了更大需求。

标注（黄） | 位置 825

第三，城市的发展、学术的兴盛，都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大幅进展。



标注（黄） | 位置 844

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

标注（黄） | 位置 863

西欧经济在历史上大多是以贵金属为本位，而中国在明清之前，基本上以铜、铁等贱金属（所谓“钱”）为主要流通货币[1]。这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长途贸易发育不足，以至于低价值物品亦可充当货币；更加重要的是，大一统的中国政治结构以权力为货币价值背书，在大多数时候，是政府权力决定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价值多少。

标注（黄） | 位置 888

威尼斯政府受制于市民社会的制衡，尊重债务还款义务，而不是如同宋王朝一样直接印制无须赎回的纸币；也受制于国际贸易中的金本位制，发行的债券必须维持与金的可兑换性。

标注（黄） | 位置 907

中国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以及政府权力。

标注（黄） | 位置 908

行政官僚们决定了城市的布局，控制了通讯，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司法、军事、贵族或教会等势力的挑战。他们的权力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可以通过施舍各种恩惠来增加个人收入，而百姓则处于一种完全依附状态。”

标注（黄） | 位置 915

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的论述，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这种特许权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乡村之外造就了自治城镇，宛如中世纪封建制度大海中的非封建堡垒。

标注（黄） | 位置 929

彭威信所著的《中国货币史》，千家驹、郭彦岗合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

标注（黄） | 位置 930

参见《价值起源》（戈兹曼，罗文霍斯特，

标注（黄） | 位置 942

按照《剑桥战争史》（杰弗里·帕克，1999）的论述，“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

标注（黄） | 位置 959

欧洲的分裂、城市的独立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迫使各政府必须按照照价付款的方式来购买、组织自己的军需，而不是按照劫掠或者指令的方式——如果他们使用这种方式，提供复杂军需产品的企业家们将搬迁到分散在欧洲四处的数十、数百个保护地去，让国王们难以满足军需（卡梅伦，

标注（黄） | 位置 995

欧洲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

标注（黄） | 位置 1008

议会代表性与权力大小。这大体上与该国的权力均衡、市场活跃度相关，而不是与战争动员强度相关。

标注（黄） | 位置 1103

中国奇迹之母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而奇迹之父是全球先进体系的先发发展为中国创造的巨大后发优势。

标注（黄） | 位置 1110

一个社会能否取得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足够多的发展机会，并使其得到实现。

标注（黄） | 位置 1114

经济发展来自于对经济流程的不断改进，以及对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对于这类改进尝试的最大阻碍来自人的天性，即暴力。使用暴力，一个具有暴力优势的社会成员可以轻松占据别人的努力果实，这必然鼓励社会成员努力发展暴力（能力）优势；但透过暴力占有别人的成果本身是一个零和游戏，无助于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在暴力横行的社会，对发展机会的追求很可能无法带给行为人相关收益，迫使人群降低对发展机会的尝试，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降低。换言之，经济增长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其中的核心是社会如何控制暴力、建立稳定的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以保证和平环境中人类合作关系的扩展。前

标注（黄） | 位置 1122

在个人使用暴力的权利与能力被相对剥夺后，政府有效掌握军队，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建立分级的政府治理机制。其好处是让社会暴力行为被有效地抑制；其坏处是，受到武力支持的政府治理体系本身必然倾向于无限放大自己的权力与利益分享，以求谋取执政联盟的利益。这反过来会阻碍社会对发展机会的投入与尝试。对

标注（黄） | 位置 1139

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等人的理论框架，没有建立起合格现代政治体制的国家属于自然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缺乏权力的广泛、合法基础，往往是执政联盟联合分利集团对国家实施政治与经济剥夺，被诺思称为权利限制秩序。

标注（黄） | 位置 1146

维持一个正常行使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府所必需的成本与支付给分利集团的代价都不公正地强加给被统治阶层，规则没有公平合法性可言，被剥夺获利还是不正获利完全视每一个个人是否隶属执政者联盟而定。这必然造成两方面的恶果：首先，政治稳定很难维持。在执政者联盟内部，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基于局势的评估与计算，随着形势与格局的不断变化，旧有的分配格局很可能并不与各个集团的势力相配合。觉得所得配不上自己实力的集团很可能会选择挑战现有秩序，而一旦无法取得执政者联盟中别的集团的让步与妥协（这注定是困难的），冲突就可能爆发。

标注（黄） | 位置 1156

其次，经济自由被限制，以至于经济绩效不佳。在自然国家的权利限制秩序社会中，统治集团“必然通过限制组织的权利来防止租金因竞争而消散，以镇压潜在的反对派”。

标注（黄） | 位置 1238

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提出的分散知识的概念吻合。按照哈耶克的分析，知识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分散、不稳定与不完美的，这些分散的主观知识通过人群互动与合作来共同作用，产生动态变化的市场结果。价格机制（更宽泛地说，市场过程或者说人际关系合作）恰是从个体知识之间的互动中产生总量现象与信息的机制。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是在人际网络中产生对市场、别人以及别人的想法的认知，其产生的知识内嵌于网络结构，内嵌于这个网络结构所规定的他与别人的互动，其产生的知识必然是主观的、不稳定的与不完美的；同时，依据这些分散、不稳定、不完美的知识来产生的互动结果，必然是动态的、混沌的、不确定的。动态性是指，任何一点边际变化（哪怕是某一个边缘节点的一时心血来潮）都会造成与他链接的节点的认知改变与子网络宏观现象的改变，而由于边际变化层出不穷，人际网络的呈现结果必然是动态变化的。混沌性是指，由于人际网络互动中包含的反射性与缠绕性，一个无穷微小的边际变化都可能造成结果的巨大不同（这正是混沌现象的定义）。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以上的两种性质，人际网络中的任意节点都不可能对未来有完美预期，对于未来结果的分布概率也无法形成完美预期，不管他多么努力地收集信息、建设模型，注定有很多信息是他无法收集到而存在于分散化的主观知识中的；就算是他收集到了全部这样的信息，一秒之后信息集也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混沌性会将任意小的边际变化放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

标注（黄） | 位置 1264

一个经济体能否取得持续发展，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多的个体愿意且能够发起这样的近乎随机的改进型试错尝试；

标注（黄） | 位置 1274

技术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它大体上有两个来源，一是长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二是科学。



标注（黄） | 位置 1276

只有当行为人能从新技术的发明与采用中获取足够大的利益时，发明和采用才能是大规模的。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有两个环节：第一，明确界定权利，保证相关利益归行为人所有，抹平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鸿沟；第二，以市场化或组织化方式，降低采纳此新技术必须支付的巨大交易成本。发展机会与利润机会是两个互相联系，但并不相同的概念。前者指全社会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技术革新与组织革新，而后者则是指一切能为行为人带来利润的行动可能性。对

标注（黄） | 位置 1296

本质上，现代经济是建立于信贷体系之上的动态系统，信贷与生产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特征与长程表现。

标注（黄） | 位置 1366

通过学习、引进、应用先进国家已经开发的成熟技术，后发国家可以以短得多的时间取得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上的进步，这被称为后发优势。

标注（黄） | 位置 1383

来自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失败案例告诉我们，阻碍发展中经济体取得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于：没有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以至于没有将自身嵌入全球经济分工链条，从而从国外引进发展机会的速率不够。由于产权保护、法制、信息等方面的问题，实现发展机会的私人收益远低于社会收益，以至于私人没有充分的激励去实现发展机会。由于规模不经济、金融抑制、储蓄不足等问题，实现发展机会所必需进行的社会资源动员被阻止，以至于许多发展机会无法被实现。没有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以非人格化征税能力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以至于无法提供宏观稳定环境。在币值不稳、恶性通胀、巨额赤字的环境中，正常的经济活动时常中断，经济增长无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四点并非失败的原因，而就是失败本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踏上经济赶超之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运作是否成功的巨大影响。如前所述，所谓制度就是如何约束暴力（包括民间的与政府的）而构造人群之间有序合作的环境，政府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至关重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干预可以扮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值得专门讨论。

标注（黄） | 位置 1407

企业对于发展机会的尝试受制于企业身处其中的网络结构：机会隐藏于一个特定网络的特定结构。很多时候，成功是很多因素齐聚的产物，而识别这些因素或者聚拢这些因素，唯有亲临其境的某一个企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可以做到。更加重要的是，探索未来成功机会涉及极大的不确定性。

标注（黄） | 位置 1416

当政府主动进行行业选择的时候，为其错误埋单的是普罗大众，它不会对失败有那样的戒惧忐忑，往往还会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试图通过投入更多资源、更改游戏规则等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判断。相关的利益团体也会鼓励政府机关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投放资源，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游戏规则可能被建立起来并出现寻租路径锁定、错误经年难改，僵尸企业横行的局面。

标注（黄） | 位置 1421

重要的不是政府或者个体对行业发展前景的一次性判断是否正确，而在于谁有信息优势以及判断错误的代价由谁来负（决定成功概率），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损失大小（企业的个体判断错误的代价更小），在于判断出错之后的纠错速度与机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资源配置调整是实时无限次发生的，判断对错并不要紧，但不能摆脱错误就会导致对比较劣势行业的

标注（黄） | 位置 1435

基础建设与一般制造业投资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与确凿无疑的经济效益，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具有明确无疑的技术领先性，其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确凿无疑的，不像一般制造业投资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同时，这些基础设施具有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

标注（黄） | 位置 1496

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有效投资，而只有有效投资才能有效地扩张企业的生产能力，无效投资只能加大过剩产能的堆积。我们假设市场竞争迫使每个企业都努力争取它们所能够获得的最优产能利用率，以求为企业带来最大的投资回报。每家企业在各自所受约束之内实现的产能利用率各不相同，这一被竞争格局决定的最优产能利用率也并不意味着等于100%。这样，发生在微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决定过程及其结果可以在宏观层面被汇总，从而得到得以进入总量生产函数的有效资本存量。换言之，我们假设，市场竞争将每家企业的存量资本区分为有效资本与无效资本两个部分，而所有有效资本被视为同质的、因而可以加总，并作为一个加总数进入到总量生产函数中。所有有效资本被视为同质的，赚取同等的、正的投资回报率，而无效资本也是同质的，所获得的投资回报为零。

标注（黄） | 位置 1510

在宏观层面，如果经济体持续将资源配置于竞争型投资，而在挤出过剩产能方面进展缓慢，则这个国家的过剩产能将逐渐累积，经济增长潜力下滑。

标注（黄） | 位置 1518

较低的过剩产能极大地促进了投资，并带动了经济增长。那么，过剩产能本身受什么因素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过剩产能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存量资本中对应过剩产能的资本存量挤出的速度与新增投资中有效投资（发展型投资）的比例。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过剩产能挤出速度主要取决于制度性因素，包括僵尸企业是否得到当地金融体系的融资支持、产权保护是否明晰、企业是否具有软预算约束特征、企业破产困难度等。这可以视为慢变量。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积极的制度性与政策性变革（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韩国朴正熙政府的执政），将会有利于过剩产能的降低。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有效投资比例除了受到制度性变量（如创投体系、科研开发投资占比、产权保护程度、兴办企业难易程度等）的影响外，更加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出口。类似地，我们用出口占当年GDP之比与出口当年增速之积来定义出口贡献。

标注（黄） | 位置 1588

一轮成功的经济腾飞往往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改革阶段、出口拉动阶段、加杠杆阶段。其中最为困难的是改革阶段。这一阶段必须解决一系列的制度弊端，以塑造能够动态响应国际经济竞争的经济体系，为下阶段的出口拉动打下基础。

标注（黄） | 位置 1720

历史经验是，凡是华人从政府手中赢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经济自由，他们的创业精神与实用理性的态度，都可以鼓励他们创造出巨大的个人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发生的就是大体相同的

标注（黄） | 位置 1727

中国经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链条，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逻辑起点。首先，通过采取外向型经济政策、设立经济特区、人民币大幅贬值、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日益深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得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的紧密联系，并充分享受到全球化红利。

标注（黄） | 位置 1733

其次，出口的高速增长其意义绝非赢得宝贵的外汇资金，而是将整个经济体系嵌入到全球分工链条，在单向的技术输入的帮助之下，中国可以发挥劳动成本低等综合比较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并改进经济流程，催生了庞大的工业化浪潮。

标注（黄） | 位置 1741

最后，与全球化、工业化相配套，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成为工业与城市理想的建设者。在

标注（黄） | 位置 1772

令许多低收入国家陷入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没有维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这主要体现为这些国家在财政体制与货币体制方面的制度缺陷，在

标注（黄） | 位置 1782

新中国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居民的管理能力超级强大，远超其他后发国家。

标注（黄） | 位置 1785

巴里·诺顿（2008）指出，“领导们竞相将自己的拥护者提拔到关键的位子上，以便在重要的时候获得关键一票。所以，一个领导提拔手下的能力，以及阻碍对手提拔手下的能力，对于建立和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至关重要”。这套体制被金克（1993）称为“双向问责制”。

标注（黄） | 位置 1789

双向问责制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激烈的升迁竞争。

标注（黄） | 位置 1793

俗语谓之：“所谓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镇干部是喝出来的，县市干部是买出来的，省部干部是生出来的，中央干部是斗出来

---

标注（黄） | 位置 1794

这种双向负责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不过一般情况下，仍旧展示了可观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最高领导层在综合平衡之后的决策（不管是否自我矛盾）被细化成不同的政策目标，层层发包给下级政府与官员。

---

标注（黄） | 位置 1804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财税体制得以建立，中国政府首次有能力对经济活动征收足以支持政府活动的财税收入。

---

标注（黄） | 位置 1808

第二，以公司法改革为核心，政府允许民间社会拥有更多的经济自由。

---

标注（黄） | 位置 1816

第三，以1995年《银行法》通过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货币体制得以建立。

---

标注（黄） | 位置 1824

第四，以汇率政策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出口导向型经济道路得以确立。

---

标注（黄） | 位置 1855

各地竞争的结果是令成功的政策得以延续，而失败的被淘汰。这个过程当然也充满腐败，但这属于经济租金被创造之后的再分配过程，而不涉及发展机会之实现与否本身。

---

标注（黄） | 位置 1894

经济危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生性现象，其根源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动态经济，依赖对发展机会的探索来实现增长，这种探索由金融体系来评估其回报与风险，而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必然推动这种评估呈现出周期运动的特征，并带动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之间震荡。换言之，繁荣与危机是现代经济实现增长的固有方式，而其中的核心机制乃是金融体系对资本回报率的风险评估。因此，要理解经济危机，我们必须理解货币与信贷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关系。

---

标注（黄） | 位置 1911

货币起源于私人之间对债务关系的认可并给出支付承诺凭据，而货币本身也可以定义为被一个社团接受的支付承诺工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数量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

标注（黄） | 位置 1935

在古代社会的很多情况下，包括现代社会中的某些特殊情况，很多交易可以依靠这种“支付承诺”的发起、转让、轧账与结算来完成，真正需要对支付承诺工具本身进行过手转移的情形并不很多。

标注（黄） | 位置 1937

私人性质的“支付承诺”如何导致贵金属货币的诞生？关键在于如果交易从熟人社会外溢到陌生人团体，私人性质的支付承诺可能就不敷使用。在一个小团体内，只要发起人信守其支付承诺，则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代表这种承诺而充当交易中介，但如果需要在不同的团体之间完成交易，支付承诺必须具有被不同团体的人信任的性质，而贵金属在这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

标注（黄） | 位置 1949

为什么稀缺性是其中最重要的性质？支付承诺代表着发起这个承诺的人会信守承诺，只要对方支付给他由他发起的支付承诺工具，他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换言之，支付承诺代表发起者对其社团的负债。如果贵金属被不同团体的人认可为合法的支付承诺工具，任何贵金属数量的边际增加都意味着旧有负债的“减记”，也意味着持有现存贵金属之人的财富的缩减。因此，贵金属增加的过程就是财富与债务关系再分配的过程。如果不具备稀缺性，贵金属所代表的债务承诺价值在不断大幅缩水，交易者将难以接受它作为支付承诺工具。稀缺性，加上诸如容易携带、不会变质、容易切分、不易磨损、难以伪造等其他可贵性质，贵金属最有可能得到跨社团的信任。

标注（黄） | 位置 1957

贵金属作为支付承诺工具的价值绝不是其含有的金属量的价值，而是社区约定俗成、共同信任的、承诺交换的物品的价值。换言之，私人发起的（各种）支付承诺出现在先，这种支付承诺逐渐与贵金属挂钩发生在后，后者解决了跨社团交易之间的信任难题。在

标注（黄） | 位置 1975

降低铸币成色摊薄了单位货币代表的支付承诺价值，相当于重新分配了财富，令统治者凭空扩大了对社会产出的支配份额。

标注（黄） | 位置 1978

币值摊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复本位制，即黄金与白银共同作为广受认可的支付货币。历史表明复本位制具有一些内在的难解之处。黄金的性质优于白银，产量也更少，使之较适合于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工具，黄金所代表的支付承诺更加可信，其价值也更加稳定。但黄金价值过高，许多国内的、小额的、日常的交易不适合使用黄金，这些场合，白银作为支付货币更加方便。某些情况下，币值更低的铜甚至也被广泛用作支付工具。这样，复本位制是很自然的存在。

标注（黄） | 位置 1999

货币起源于被一个社团所认可的支付承诺，其本质是作为结清债务债权关系的支付工具。社团成员可以发起设立各种形式的私人货币，但跨社团交易的需求导致私人货币逐渐归约为贵金属货币。



标注（黄） | 位置 2069

只要遵循可兑换性原则，即使货币数量增加了，单位币值也没有被摊薄，这与新发现贵金属不可避免地摊薄币值形成本质性区别。

标注（黄） | 位置 2099

银行生意的本质在于，它必须管理其资产与负债，以至于资产所获得的回报（主要由贷款利息构成）必须大于负债的成本（主要由支付的存款利息构成）。资产的回报率往往与期限及风险成正比，而支付的负债成本也与期限相关，由此导致银行业经营具有几个显著特征[1]：第一，银行资产与负债之间存在期限错配，负债平均期限比资产平均期限短，银行依靠将短期限负债转换为长期限资产来支持经济体的投融资行为，并收取利率的期限差价。第二，银行资产与负债之间存在风险错配，理论上，储户要求其在银行的存款（对银行而言是负债）是无风险的，而银行资产却存在风险。承担的风险不同成为银行收入的另一个主要来源。第三，银行持有的资产与负债在期限、风险度等方面是分散配置的，分散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教训是银行天生就明白的。为了应付客户的短期需求，银行必须保留一定量的具有最高流动性、最低风险的资产（

标注（黄） | 位置 2145

可兑换制与金融体系对流动性需求的巨大波动性之间的矛盾。

标注（黄） | 位置 2202

中央银行的职责至少包括如下三项：第一，在金融危机时刻承担最后贷款人与最后交易商职责，阻止金融体系的自我毁灭；第二，日常流动性管理以避免流动性冲击演变为金融危机；第三，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降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而不论是促进就业还是维持物价稳定都不是中央银行的职责。

标注（黄） | 位置 2275

债券利率=基准利率+期限溢水+信用风险溢水。

标注（黄） | 位置 2343

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企业能够获得的杠杆率，进而决定了债务增加额、外源融资，在给定上期利润的情况下进而决定投资量。经济产出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分配，劳动者所得没有被消费的部分构成储蓄，恰好能够为企业外源融资支持的投资提供融资支持。

标注（黄） | 位置 2358

理想的经济波动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复苏：此时的投资规模不大并继续下滑，其中主要体现为库存投资的下滑，而有效投资规模虽然低于平均水平，但变化幅度不大，其占总投资的比例因而上扬。有效投资占比较高，有助于推动产能利用率上升；而产能利用率的上升有助于经济体发现并利用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反过来带动有效投资占比的上升。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定义了经济的复苏阶段。利润水平在这个阶段上扬，外源融资上升速度较低。繁荣：随着经济复苏，库存投资开始增加，经济复苏也带动

外源融资与储蓄上扬，而随着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张，有效投资在其中的占比从高点出现下滑。虽然下滑，但有效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仍旧较高，足以推动产能利用率继续走高，即使上升速度较前期有所下滑。滞胀：此时库存投资继续增加，有效投资占比不仅继续降低，而且降低到无法支持产能利用率上升的程度，产能利用率开始下滑。更严重的是，产能利用率的下滑令有效投资机会进一步减小，两者之间形成负向的相互放大效应。这一期利润处于较高的位置，但主要受益于资本品价格的上扬。利率水平大幅提升，抑制企业债务杠杆率的提升。萧条：经济陷入不景气，库存投资受到杠杆率的约束而转折下滑，而有效投资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有效投资占比从最低点缓缓上升。有效投资占比虽然小幅回升，但仍旧很低，导致产能利用率继续走低。利润大幅缩水，而投资缩水的速度更快，储蓄率上升。可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有效投资机会的有限性与债务杠杆的动态性是理解经济周期的关键。在

---

标注（黄） | 位置 2387

金融危机可以定义为经济风险的大爆发，那么，经济风险的最终来源是什么？很可能，经济风险的最终来源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以至于投资建设的生产设施设备无法获得合格的资本回报率，最终无法满足生存约束。按照前面的定义，债务为未来需要兑现的支付承诺，资产为未来能够带来一系列收益流的设施设备。负债者依靠后者提供的未来收入流兑付未来需要兑现的支付承诺。由于存在着本质性的不确定性，债务与资产的价值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对银行以及企业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对于借款者而言，它们的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资本回报率上，即使这意味着以更高的杠杆率、承担更大的风险为代价；对于银行而言，则必须对自己的资产与负债进行积极的、动态的管理，以规避这种风险。本质上，这种管理是对风险进行动态评估与定价。利率及其隐含的风险正是在这种评估中确定自己的值。如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则企业资产无法带来支付未来付款义务的一系列现金流，这是经济风险的最终微观

---

标注（黄） | 位置 2400

错误的资源配置得以继续，则必然发生两件事情：首先，实体经济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将会下滑，过剩产能大幅增加，很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次，金融财务层面，这些无法在财务上支撑自己的项目（企业）必然依靠外源式融资支持，从而推高债务杠杆率。

---

标注（黄） | 位置 2403

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常态，主要是产能利用率与投资有效性互动的结果；

---

标注（黄） | 位置 2462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伟大赶超其本质无非是两点：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增大了经济自由度，让中国具有了更强大的能力与动力去捕捉与实现发展机会，而人均产出只有同期欧洲1/24的巨大后发优势提供了充沛的发展机会供中国汲取。冷战结束、全球化、改革开放等等因素是中国奇迹背后的力量。

---

标注（黄） | 位置 2552

负面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地方政府的强烈投资导向导致基建投资过多；其次，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过度投资导致债务风险累积。

---

标注（黄） | 位置 2601

所谓“共管账户”实际上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为财政部的等额付息债券，财政部以未来获得的分红、所得税等归还，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其优点主要在于，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中的坏账又得到剥离。

标注（黄） | 位置 2639

债务支出所形成的资产可以分使用者（社会）与运营者来分析。从使用者的角度看，评价政府债务支出形成的资产，主要看这一资产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

标注（黄） | 位置 2641

更重要的是，从资产运营者的角度看问题，投资是否具有债务清偿性，依赖于这项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是否足以覆盖还本付息的要求。

标注（黄） | 位置 2688

地方政府不仅对信贷具有难以餍足的渴求，而且对利率高低不敏感。很多项目上马考虑的并非是经济合理性，而是GDP锦标赛的政绩压力，更何况有些地方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债务未来的归还问题——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无须为下任的政绩考虑。这样，不论央行如何调控其货币政策，总是无效的——货币政策过分宽松的时候（例如2009年），信贷自然是快速上升的；货币政策过分紧缩的时候（例如2013年下半年），地方政府仍旧在大举增加负债，投资于已经过剩的基础建设项目或者变相支撑过剩行业的国企。

标注（黄） | 位置 2730

消费本身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消费是对这个经济体生产出来的产出的消耗，与下一期该经济体能否拥有更大的产出无关；唯有投资，亦即人均资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扩张该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标注（黄） | 位置 2739

投资之所以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能够改进经济流程与技术水平的发展机会，这些发展机会一旦被实现，就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合理性与技术水平，从而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而发展机会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投资，以将更高的技术水平整合在生产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资项目没有将人、机器设备、市场环境合理地结合在一起，就可能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而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这一类投资是无效投资。

标注（黄） | 位置 2758

投资与产能在目前（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是否高于市场需求量，最终的判断标准是看这些投资项目能否获取合理的资本回报率。不能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率的投资项目就是无效投资。

标注（黄） | 位置 2806

对于中国来说，价格扭曲主要体现为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对广泛的市场实施扭曲性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利率（资金的国内价格）、汇率（资金的国际价格）与土地价格。

---